

黑犬与白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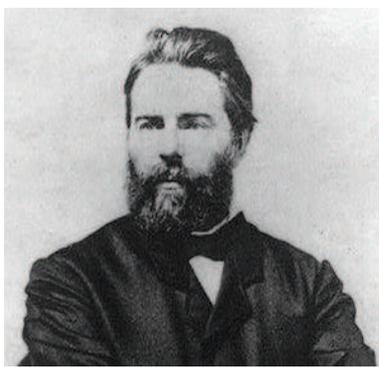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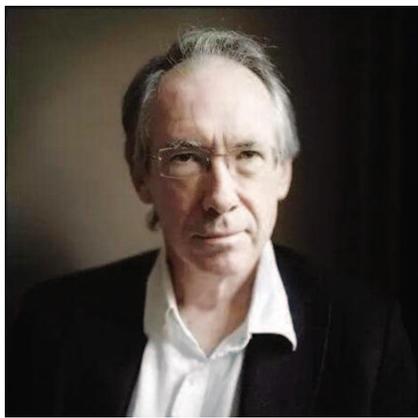
■王宏图

近年来,有着英国国民作家美誉的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在国内风靡一时,几乎全部作品都被译成了汉语。在“文学死了”“小说死了”之类悲观论调不绝于耳的年代,他的畅销似乎显得有点匪夷所思。纵观他的全部作品,大都篇幅不长,除了被搬上银幕的《赎罪》之外,其余均未超过20万字,颇有一番小清新的气象。

问世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黑犬》在麦克尤恩早期作品中独树一帜,这倒不是由于开篇里孤儿杰里米绵长絮叨的自白让人想起他的出道之作《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而是整部小说嵌入了黑犬这一醒目的象征意象。它虽然深藏在若隐若现的远景中,却暗中操纵着女主人公、杰里米的岳母琼的命运演变。

二战过后,琼与丈夫伯纳德到法国度蜜月。一次她不经意间与两头凶悍无比的黑狗相遇。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搏斗,她终于摆脱了恶犬的纠缠。如果这只是两头饥肠辘辘的野狗,那琼与它们的对峙只不过是人与自然抗争的一曲变奏罢了,而麦氏此书的主旨也意不在此。的确,随着情节的推进,读者得悉这不是两条普通的野狗,而是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它们是盖世太保的警卫犬,用于追捕抵抗人士。令人发指的是,它曾经过特别训练,曾对女性实施强奸。在此,黑犬不仅仅是自然界野蛮力量的载体,而且与纳粹沆瀣一气,成了他们忠实的帮凶。

正由于这一次与黑犬的相遇,改写了琼日后的人生轨迹。她过后在当地买下了一座农庄,长年隐居于此,与丈夫伯纳德在精神上渐行渐远。直至垂暮之年,恶犬的形象依旧会浮现在她眼前,成为弥散在



◀伊恩·麦克尤恩

▲麦尔维尔

天地之间的邪恶的化身。无独有偶,冷战濒临结束之际,伯纳德在坍塌的柏林墙边目睹了一个土耳其移民遭到一群新纳粹光头党围殴的场景:它与令人毛骨悚然的黑犬形成了微妙的呼应,在这些人的目光中喷射而出的黑暗、仇恨、狂暴与黑犬别无二致,展露出他们内心深处那一片阳光无从涉足的黑暗领地,它与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上世纪初描绘的迷失在非洲大陆深处的库尔兹身上呈现的“黑暗的心”可谓异曲同工。

不难发现,麦克尤恩在书中浓彩重墨渲染的黑犬形象,尽管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但其意蕴却是明晰单一,而且是人为插在作品中的一个外在的象征符号,斧

凿痕迹明显,没有融化在文本的内在肌理之中。

相比之下,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白鲸》对象征物的处理运用则显得更为复杂、精妙。单就整部作品的体量来看,《白鲸》洋洋洒洒50余万字,不仅篇幅庞大,而且文体驳杂,结构松散,在今天严苛的编辑读者眼里,起码可以砍掉三分之一。作为地球上体形最为庞大的动物,从《旧约·圣经》开始,它的记载在西方典籍中便源源不断,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代表作之一《利维坦》书名的拉丁文写法为Civitas,意为大海怪、大鲸;他藉此喻指凌驾在社会之上的庞大可怖的国家机器。《白鲸》中的主角其实有两个,一个是

名为“莫比·狄克”的白色巨鲸,另一个则是追杀者亚哈船长。长时间里,白鲸肆意横行于茫茫大海之中,使众多水手船艇葬身于鱼腹之中,连捕鲸老手亚哈船长也被咬去了一条腿。全书以亚哈倾全力追击白鲸莫比·狄克为叙述主线,凸现了亚哈近乎癫狂的追捕历程,最后以他与白鲸同归于尽而告终。在麦尔维尔雄浑有力的笔触下,亚哈船长这幕捕鲸的历险一波三折,惊心动魄,既体现了他的坚韧豪迈勇敢,也折射出其偏执疯狂痴愚。他千回百折的沉思冥想,以及面对大海巨鲸时的咆哮,格调雄浑、苍凉,让人联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忧郁王子哈姆雷特与李尔王,也能捕捉到弥尔顿《失乐园》中决绝反叛上帝的撒旦的流风余韵。

作者对亚哈的双重态度也体现在对白鲸的描绘中,孔武有力的莫比·狄克既是大自然澎湃生命力的象征,又蕴含着毁灭、死亡的邪恶力量。在白鲸与亚哈身上,善与恶、上帝与魔鬼齐肩并立,俨然如一对孪生子——这些描绘赋予了这两个形象异常复杂的内涵。和麦克尤恩笔下的恶狗相比,白鲸不仅在体形、力量上远超前,而且它本身是作品的主人公之一,对它的追捕构成了情节推进的主轴,全然不是作者硬性植入的象征符号。

此外,白鲸这一形象内蕴的丰富隐微也是黑犬无法媲美的。黑犬作为人性恶的隐喻,仅仅触及到了政治与伦理层面,而白鲸则深入到人性黝黑的深处,在那儿众多芜杂的枝杈盘结交缠,难分彼此,人性的辉煌伟岸与邪恶卑下共生共存,包蕴了生活中诸多难以求解的矛盾冲突。相形之下,黑犬则没有提供如此宏阔巨大的意义空间。

香江叶落粤天高,大侠英魂任逍遥。去年当代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先生逝世,虽享94岁高龄,但我仍深感悲哀。我不禁想起亡友冯其庸老学长1981年在访问美国期间夜读金庸武侠小说,激赏之余,情不能禁,写诗一首的情形。诗曰:

千奇百怪集君肠,
巨笔如椽挟雪霜。
世路崎岖难走马,
人情反复易亡羊。
英雄事业酒千斛,
烈士豪情剑一双。
谁谓穷途无侠笔,
依然青史要评量。

——赠金庸

此诗发表后,金庸大为欣赏。我以为,其庸先生的这首诗,形象扼要地点明了金庸武侠小说的艺术特点及历史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0年内,未必能产生第二个金庸。

真是三生有幸,我与金庸有过交往,成了友人。2007年7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我提供的1922年刊行的《童谣大观》一书,分别请金庸和我作序。金庸在序中说:“资料中说到,中国社科院的王春瑜先生也很推崇这本书。王春瑜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他到香港来访问时我曾接待过他。他对历史的造诣我是很佩服的。虽然,我们两人对于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的事迹等等意见差距很大。但意见不同并不表示不可做朋友,我仍记得他对历史的忠诚和执着,以及我心中对一位历史学家的敬佩。”金庸对我的夸奖,我固然不敢当,但老先生当年对

忆金庸

■王春瑜



金庸

我的盛情款待,是我终身难忘的。

1987年12月28日,香港大学中文系和中国文化研究所联合召开了为期四天的“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美国、法国、中国的文史学者20余人应邀赴会。我提交大会的论文是《论蒙汗药与武侠小说》。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与金庸相识。

金庸是位大作家,也是以写《明报》社评闻名于世的政论家和拥有几亿港元财产的企业家。他居住的山顶道一号住宅,是香港的十大豪宅之一,有假山、游泳池等。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位具谦谦君子之风的学者。记得会议开幕那天,与我同住一个宾馆的香港学者潘铭燊博士、台湾报人叶洪生先生,以及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汉学家马幼垣教授等,都提前赶到了会场。主持会议的陈

永明博士却对我们说:“查先生早来了!”金庸微笑着与我们一一握手寒暄。在开幕式上,他作了长篇发言,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其中说到武侠小说对辛亥革命的促进作用。这是个很新颖、也很重要的观点。犹忆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曾读过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日本创办的《江苏》《浙江潮》等杂志,即感受到其中强烈的侠义精神。我想金庸很可能也读过这些杂志,并读了近代史专家的有关论文,才会得出那样的结论。他的精彩发言,决非一般文人所能道也。

金庸是位性格活泼、幽默,也爱开玩笑的人。第一天会议结束后,金庸在很有名气的利园酒店彩虹厅,设晚宴招待与会学者以及记者和香港文化界人士,如著名作家、也是金庸挚友的倪匡等

人,整整坐满了三大桌。因是对号入座,我眼睛近视,而且平素一贯大大咧咧,看到第一桌金庸对面的席上,有我的名牌,就坐了下来。金庸见状,马上招呼我说:“王先生,请过来,那是我们王世瑜主编的座位。”正说着,香港著名才子王世瑜先生已经走过来,金庸作了介绍。我俩见彼此的名字如此相近,不禁笑了起来。可是,当我在紧挨金庸的右手席位看到我的名牌时,心中不禁一动。我知道,这是主宾席,在整个宴会期间,酒菜都得首先从这儿上起。这真使我不安。虽说作为大陆的文史学者,无论在国内或国外的国际会议上,我从来都是谈笑自如,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我宣读的论文《论蒙汗药与武侠小说》也受到了学者的好评,但是,想到自己毕竟是史学家,偶而涉足武侠小说研究领域而已,敲敲边鼓,并非武侠小说

专家,特别是想到赴宴的其他年长的学者,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坐在主宾席上。然而我随即意识到,这是金庸对大陆学者的礼遇,也是他对大陆情有独钟、无怨无悔情结的流露。他对故国山河、斯土斯民仍怀着赤子之心。我的有些惴惴不安的情绪,很快便被金庸幽默的致词引起的笑声、掌声所消除。他说:“小说里的每次武林大会后,总是盛宴,接着就是打个你死我活。这次我们召开武侠小说讨论会,也是武林大会。不过,希望诸位小宴后,千万别打斗!”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

金庸还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家宴,中西合璧,一碗泰国进口的燕窝粥就要花1000港元。我这大半辈子吃过的最好的饭,是金庸先生家中的这顿饭。

金庸先生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华夏古村镇生态文化纪实》

江泽慧 主编
人民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定价:298元



本书遴选120多个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并在自然地貌、聚落形态、人文历史、民族风俗、民间技艺等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古村镇,进行实地调研,访谈采集挖掘整理,以纪实笔触,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古村镇的生态智慧、文化遗存及其新时期发展的时代风貌。

发行业务电话:010-65257256 65136418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网址:
www.peoplepress.net